

洛阳新出西周卜辞考释及相关问题探索

唐冶泽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摘要：本文对洛阳新出土的一件西周初期牛胛骨卜辞进行了考释，认为其中有以“百矢”和若干贝买车的内容；同时对箭矢作为实物货币与马车进入市场交易进行了考察，考证出所记之车应为兵车；然后在实测的基础上论证了垸与铎的进位制度，从而推断出这条卜辞中缺损的数字范围以及一支矢和一辆车体现为贝币的大致价格。

关键词：百矢；贝币；实物货币；垸与铎；车价

中图分类号：K8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3-0052-06

《文物》2008 年第 11 期发表了蔡运章先生《洛阳新获西周卜骨文字略论》一文，公布了 2008 年初洛阳东郊出土的一件西周初期的牛胛卜骨（图一 1~2），其正面刻有卜辞 3 条共 14 字（有阙字），系横置卜骨后再竖刻于卜骨正面的近臼部，其中两条刻于上方，一条刻于左下方（图二），蔡先生隶定如次：

𠄎曰：其已。

□贝用买车？

白兑车，由克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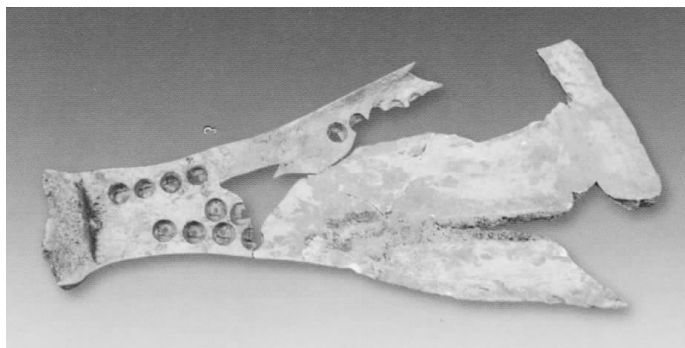
从这组卜辞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西周时期货币发展的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信息，很有研究价值。下面我们也对其进行一些考释和探索。

第一辞刻于整组卜辞的上方之右。其句式多见于西周卜辞，如周原出土甲骨中的凤雏 H31：4 之“曰毋”^{〔1〕}、H11：5 之“曰子（巳）”以及河北邢台南小汪遗址出土西周卜骨上的“𠄎曰巳”^{〔2〕}等等。诸家都从《说文》释作“卜问也”^{〔3〕}，与殷墟卜辞中的“贞”字用法相当，可从。巳字在西周甲骨中亦多见，如凤雏 H11：76 之“曰巳”，H11：114、H11：134 和 H11：141 之“弜巳”，以及北京昌平白浮 M3：2 之“其巳”^{〔4〕}等等，

多家释同祀，即祭祀之义^{〔5〕}，但也有人释为止、罢、改等^{〔6〕}，而我觉得释祀更合理些。“曰巳”就是要祭祀，“曰毋”或“弜巳”就是不祭祀。从西周甲骨文的内容看，周人不时会就祭祀与否进行卜问，且与同版甲文多无内容上的紧密联系，似以祭祀为占卜中的一道程序。此辞也是如此，卜问：要祭祀吗？蔡先生辗转训巳为成、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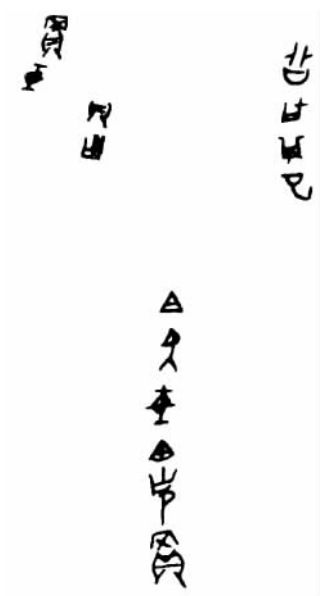
1



2

图一 卜骨




1. 卜骨正面 2. 卜骨背面



图二 卜骨刻辞摹本

之意，虽然另辟蹊径，但亦似觉纤曲。

第二辞刻在第一辞之左，分为两行，其辞首缺损 1~2 字，对照第三辞并从文意看，所缺很可能为数字，意为能否用若干贝买车？

第三辞刻于第二辞之左下方。其中的“𠂔”二字，蔡先生隶为白兒，谓即伯貌，解作人名。但我认为释为“白矢”更符合字形文义。白矢即百矢，白通百，见于殷墟卜辞，《卜》二四五：“戊子卜，宾贞：今夕用三白羌于丁？用。”即以白为百。之上部不作白（其写法与前一白字互异，可证），应为矢锋之形；其下部也不作人，而是矢尾之像。矢在甲文中或写作（《文》三三六），与此字几近全同，可为确证。此辞还有一个“由”字，在西周甲骨文中常见，有人据字形释西^[7]，也有人据《说文》释斯^[8]，但多数学者结合字形字义释夷，认为其用法与甲金文中的佳字近同，也相当于后世文言文中的惟、维等，是个助词，一般并无确切含义^[9]。其“由克……”的句式，在西周甲骨文中也是习见，如凤雏 H11：36 之“今秋，王由克往密”，及 H11：6、H11：21、H11：32 之“由克事”等等，作为问句，都含有能不能、行不行的意思在内。故此辞应隶为：“白矢，车由克买？”意思是问能否以百矢买车？

兹将以上三辞按上列考释重新隶定、断句如下：


卦曰：其已(祀)？

□贝，用 / 买车？

白(百)矢，车由(夷)克买？

综上，这是一段关于买车的卜辞，首先是卜问这事需要祭祀吗？再问以若干枚贝买一辆车行不？最后问用一百支箭矢买一辆车能行不？

二

西周时期，是我国上古经济相对繁荣的时期，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较大，但当时还没有出现统一规范的货币，市场上最常见的货币是海贝，以朋为单位，同时与其它实物货币、称量货币（铜块）和原始铸币（铜贝）混合流通。其中实物货币种类繁多，如装饰品、工具、农具、牲畜以及生产半成品如布匹、蚕丝等等，都可作为一般等价物进入市场交换，一些实物货币后来就演变成真正的货币，如璧环演变为圆钱，货贝演变为铜贝和蚁鼻钱，铲子演变为布币，小刀演变为刀币等等。将“𠂔”释为“百矢”，而且能用之买车，也体现了车的价值，这意味着箭矢在市场上充当了一般等价物，执行着货币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实际上也就是扮演着实物货币的角色，这在考古中还是第一次发现。但箭矢为什么能承担货币的职能呢？第一，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知道，先秦时代虽然商品经济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成熟的、统一的货币制度还未形成，实物货币、称量货币与金属铸币并行不悖，互相补充。秦统一时，曾规定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其余“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10]，这反过来说明这些“珠玉龟贝银锡”等等，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实物都曾经在市场上发挥过货币的职能。西周中期的召鼎铭文说“用匹马束丝”可“买汝五夫”，《诗经·氓》有“抱布贸丝”的记载，可见马匹、蚕丝、布匹等也曾充当过货币。推而广之，包括箭矢在内的其它能充当实物货币的商品也不在少数。

第二，箭矢具有作为实物货币的条件。一种商品要成为一般等价物，必须具有单位价值量较高，易分割，能贮存，人们乐于接受，方便耐用等优点，而箭矢是基本具备这些条件的。箭镞为铜制，而铜是当时流通中最重要的—般等价物之

一。殷周时称铜为金，殷王和周王常用以赏赐臣下以铸礼器，它既是财富的体现，也是贵族地位的象征。铜块在当时也作为称量货币于市场上流通，其基本称量单位为铢^[11]。更有意义的是，商代后期以来，出现了铸为贝形的铜币，即仿铜贝，与海贝一道作为货币流通，不少人认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而铜铢与铜贝一样具有自然单位，单位价值量适中，方便携带和使用，因此，箭矢进入流通就是不难理解之事。

箭矢还是男人的常用品，与贝作为装饰品而为女人所常用具有同等的意义。即每个男人都需要，都不能少了它，这才可能成为人人都乐于接受的一般等价物。上古除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外，所有成年男子都是天生的战士，贵族和平民都有在战时自备武装上战场的义务，弓矢戈矛马匹战车甚至随从都要自带，只是根据身份等级和经济力量的差异，所带装备各有不同而已。而当时战争频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不是抵抗别人的进攻，就是主动进攻别人；有力量而不发动战争，会被认为是耽于安逸^[12]。并且箭矢还是生产工具，打猎时也要大量用到它。另外儿童从小就要学习射箭，“射”是“六艺”中仅次于礼和乐的重要学习内容。因此不管是平时还是战争时期，箭矢都是需要量大的消耗品，必须经常补充。这为箭矢大量进入市场提供了基础，也为其作为实物货币奠定了条件。以其市场需求量大，作为实物货币之一，其流通量和流通速度也一定不小。但同时也因其消耗量不稳定（战争期间会大量退出流通，战后又会充斥市场），难以满足市场的稳定要求，所以最终没能发展为真正的货币。

三

车能在市场上出售，这在考古中也是第一次发现^[13]。据《世本·作篇》记载，车是夏代奚仲发明的（一说为黄帝发明），而商人先祖相土又发明了马拉车，另一个先祖王亥则常驾着牛车搞长途贩运。殷周时，马车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只有贵族才能乘车，只有贵族才能拥有车。从考古发现来看，车是商代后期突然出现的（但曾发现过早商的车辙印），并且只有马车，包括兵车和乘车，其基本造型几乎完全一致，由独辕、一

衡、双轭、一舆、一轴、双轮构成。因此这组卜辞里的车，也应当是这样的马车。

虽然贵族都可以拥有车，并且也需要车，但却不是每个贵族都能制造车。当时的制车作坊，是最复杂、分工最细的跨行业手工作坊，《考工记》说：“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即在当时的手工业中，车辆制造涉及的工种最多，社会协作度最大。它涉及木工、皮革工、绳索工、制铜工、装饰工等等，每一工种内部还可细分，如木作部分又可分为轮人（制造车轮和车盖）、舆人（制作车箱）、辀人（制作辕轭）等；装饰工亦可细分为涂漆工、彩绘工、雕刻工等，其工艺复杂，工序众多，分工细致，合作紧密，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科技水平和作坊规模发展的典型体现。同时因车能体现社会地位，其制作往往精益求精，装饰豪华，所以一般贵族是难以自办这种作坊的。

从史籍记载来看，春秋战国时的手工作坊主要由官府经营^[14]，其中的劳动者是地位低下的世袭工奴，其产品大多不进入市场交易，而是以赏赐的方式提供给贵族，尤其是马车这种既可体现身份地位，也可用于战争的复杂产品，更是要由官府手工作坊来生产。推想西周也应是这样。但其中又要分两种情况：一是贵族日常出行乘用的车，主要由上级贵族赏赐，金文中就多见周王对臣下赏赐车服弓矢的记载，这种车称为“命车”，其规格装饰与身份地位相适应，多豪华精美，但却不能在市场上出售。《礼记·王制》里说：“圭璧金璋不鬻于市，命服命车不鬻于市，宗庙之器不鬻于市，牺牲不鬻于市，戎器不鬻于市。”鬻同鬻，义为出售，买卖。因为这些东西要么具有神圣的意义，要么是杀人武器（弓矢除外），所以才有“不鬻于市”限制。二是作为重要军事装备的兵车，也称为“戎车”，以结实为要，装饰简洁，轻便灵活^[15]，需求量大，可以进入市场交换，大约有能力者也可以自己制造。《礼记·王制》有“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兵车不中度不鬻于市”的规定，反过来说明“用器”（注谓：“弓矢、耒耜、饮食器也。”）兵车之类只要“中度”（合乎规格质量），也允许“鬻于市”。由此可知，这条卜辞中所买卖的车应当是兵车。

先秦时期的军队广泛采用车战，屈原在《国殇》里对车战有惨烈的描写，因此战车是军队的重要装备，其拥有数量与军队的强大成正比，甚至“兵车”一词都成了军队或武力的同义语^[16]；而当时战争又十分频繁，对兵车的需要量很大，甚至地方基层组织也要按规定向国家提供兵车^[17]，这就产生了较大的市场需求。而这种制造复杂的商品批量地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必然导致社会生产与流通的“乘数效应”，促进相关行业的生产与商品化发展。过去我们知道西周时期许多生产、生活资料可以自由买卖，现在又从考古上证明史籍中记载的兵车弓矢确实可以进入市场交换，进一步说明其时的商品经济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四

这组卜辞也有一个令人非常遗憾的地方，就是第二辞的句首因骨头破损而缺失了一、两个字，并且很可能其中记载着买车的具体贝币数量，让我们失去了一个可以相互比较的重要数据，否则当时车、矢与贝币的比值就可以直接地知道了。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据此做些考证与推测。我们先应确定，一支箭矢能值多少枚贝币？在《周礼·考工记》中的“冶氏”和“矢人”两处都记载，一支青铜箭镞“刃长寸，围寸，挺十之，重三垓。”注引郑司农云：“垓，量名，读为丸。”宋代易祓将垓释为铢，亦即铢字^[18]，后人多从之。但这样的解释也有问题，因为《考工记》下文紧接着又载戈与戟上之刺（矛）分别也是“重三铢”，则矢之“三垓”与戈、矛的“三铢”显然不是一回事，而应该轻得多。因此我以为垓不能释铢释铢，而应该是一个失于记载的上古重量单位，或者是其时齐国的一个地域性重量单位^[19]。如果我们能据实物实测其重量，当可推断出垓与铢的重量比值与进位制度。为此，我曾向山东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张爱云女士求助，蒙张女士赐告春秋齐国“高子戈”的重量；我又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品部赵芸女士的帮助下，从馆藏春秋后期至战国早期的青铜箭镞、戈、矛中各选取一些常见器进行实测称量，谨在此向二位女士致谢！现将称量结果报告如下：

表一 青铜镞实测重量

藏品编号	重量(克)	选取标准
15198	36.5	1.皆为箭镞中的常见品，特大特小或异形者不取；2.皆为双翼，有铤，品相完好；3.时代皆为春秋至战国初；4.自大至小选取5枚，使其具有代表性。
15179	27	
15202	15	
15191	12.75	
15192	7.5	
平均重量	19.75/枚	

表二 青铜戈实测重量（包括高子戈）

藏品编号	重量(克)	选取标准
15090	340	1.皆为狭援中胡直内，援与胡的角度近90°，品相完好；2.时代为春秋至战国初；3.自大至小选取5只；4.除高子戈外皆为巴蜀戈，饰有巴蜀纹饰。
52512	226	
15093	180	
高子戈	139.9	
15185	99	
平均重量	196.86/只	

表三 青铜矛实测重量

藏品编号	重量(克)	选取标准
53138	150	1.前二只为长铢，后一只为短铢，形制常见，品相完好；2.銎部皆饰巴蜀纹饰和图语，时代为春秋至战国初；3.大中小各一只。
15139	137.8	
33484	87	
平均重量	124.93/只	

从以上实测结果看，箭镞、戈、矛平均重量的比值为：

$$19.75 : 196.86 : 124.93 = 1 : 9.97 : 6.33$$

即一枚箭镞的重量非常接近于一只戈的1/10，但却相当于一支矛的约16%。造成戈、矛与箭镞比值不同的原因，我以为可以用巴蜀式戈、矛与中原戈、矛形制上的相似性差异来解释。我们选取的除高子戈外的4只戈，虽然都有强烈的巴蜀特征，但与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原戈在基本形制上并没什么大的区别。而巴蜀矛在形制上则较为特别，最影响重量的地方是叶片状薄刃，与中原矛的厚刃明显不同，这使得它们的重量偏轻。所以我认为，镞与戈的实测重量比值，很可能真实地反映了垓与铢的实际进位制度，垓应当就是铢的十分之一，即

$$1 \text{ 垓} = 1/10 \text{ 铢}$$

$$\text{或 } 10 \text{ 垓} = 1 \text{ 铢}$$

据留鼎铭文载：“买兹五夫，用百铢”。即铢，是说买五夫（五个奴隶）用了100铢重量的铜，即平均每夫价20铢。该铭文还记载：“我既买汝五夫效父，用匹马束丝”，即这五夫又能以“匹马束丝”的价格买到。据蔡运章先生在

《西周货币购买力浅论》^[20]一文中考证,当时一匹马一束丝的价格是100朋贝,一夫就值20朋贝。如此则有:

1夫=20铢铜=20朋贝

即 1铢铜=1朋贝

一朋贝有两串,每串的贝币数量主要有两说,一说是5枚,一说是10枚。研究者们一般都取5枚一串,每朋10枚。再联系上文我们推测的坑与铢的关系,我们就有如下结论:

1坑铜=1枚贝

则 1支箭鏃所用铜材的价值=3枚贝

如果我们再从制造工艺上看,箭鏃的铸造复杂而精细,另外还有箭杆、尾羽的制作,系采用多种材料复合制成,工艺较为复杂,有相应的技术要求,则制造箭矢所需的人力、物力应该超出3枚贝。考虑到当时的劳动力价格低廉(手工作坊中大量使用工奴),又因需要量大而批量生产,因此我们仅在原材料费用上再加1枚贝的人工费和辅材费,即:

1支箭矢的价值=4枚贝

这可能就是当时市场上一支箭矢的贝币价格。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车的价格。据卜辞内容,此处的车有两个价,一个为“百矢”,一个为若干贝。假设这两个价是指向同一辆车,则也许一个是卖家要的价,一个是买家还的价,或者是占卜者心理价位中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但不管怎么说,可以认为这两个价就是这辆车的上限价和下限价,并且它们之间的价差也不会太大。而由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一支矢价值4枚贝,100支矢就是400枚贝。如果我们假设这400枚贝币就是这辆车的上限价,如前所言,下限价与上限价之间的差距不应过大,我们取100枚贝之差,下限价就不应低于300枚贝。而如果我们假设这400枚贝是下限价,上限价则不应高于500枚贝。由此我们就可以推知,第二辞句首所阙之数字应等于或大于三百,而等于或小于五百。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这是两辆不同的车的价格,一个贵一些,一个便宜一点,但这也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它们仍然是当时一辆车的价位范围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我们推测所缺之字的逻辑依据。

综上,我们得到了西周初期一辆车大致的贝币价格范围,即:

1辆车=300~500贝=30~50朋

如果取其中,则有

1辆车≈400贝≈40朋

那么,按贝币的购买力,这30朋至50朋贝能购买些什么东西呢?蔡运章先生在前述《西周货币购买力浅论》中考证了一些商品的贝币价格:一朋贝可买粮食4.62斤,一件玉璋价值80朋,买一块田6.6~8朋,一匹良马的价格是50朋,一个奴隶20朋……等等。其中,礼器和良马的价格最高,土地和人口的价格最低。一辆车大约相当于4.5~7.6块田(一田100亩,约合今60亩),或1.5~2.5个奴隶,或138.6~231斤(合34.65~57.75千克)粮食,但不如一匹良马、更远不如一件玉璋值钱。这也进一步证明这是一辆装饰较为简单,没有豪华附属物品的兵车。

不过,这里面还一些时代的差异。黄锡全先生在《先秦货币通论》一书中认为,时间越早,贝越值钱。与这块卜辞同为西周初期的一些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只占卜和祭祀用的大龟10朋,一件作为礼器的铜簋14朋,100只羊低于10朋,10个奴隶低于1朋,1家“臣”(有家室的管家奴仆)低于1朋。也就是说,一枚贝币的价值在当时甚至高于一个奴隶或一只羊^[21]。另外,据商周金文记载,天子对臣下的赏赐固然出手大方,而赐贝却常常只有一朋二朋,若赏个五朋十朋就算多的,很少有赐十朋二十朋的。如此看来,一辆车的价格已经不菲。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块牛骨卜辞字数虽然不多,但携带的信息却不少,有待学者们挖掘考证。而我们上面的考释与探索难免粗疏浅陋,有些假设和推测也有可商之处,谨以此作引玉之砖,祈盼识者指正。

注释:

[1] 陈全方:《陕西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以下凡单纯使用编号的甲骨俱同此,不另注。

[2] 河北省文管处等:《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3] 也有个别学者释为兆,见裘锡圭:《释西周甲

骨文的“𠂔”字》，《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

[4]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第4期。

[5]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第3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6] 裘锡圭：《释西周甲骨文的“𠂔”字》，《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李学勤：《释“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7] 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

[8] 李学勤、王宇信：《西周卜辞选释》，《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80年。

[9]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10] 《史记·平准书》。

[11] 蔡运章：《论商周时期的金属称量货币》，《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

[12] 如《左传·襄公十八年》载，楚康王对臣下说：“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穀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

[13] 西周中期的棚生簋铭曰：“格伯取良马乘于棚

生，厥贾卅田，则析。”有学者认为这里的“乘”是指马车，误。应为马的单位，即四马为乘。其说见刘宗汉：《金文贮字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

[14] 《国语·晋语四》：“庶人食力，工商食官。”

[15] 清·顾炎武《日知录·小人所腓》：“古人所谓兵车者，轻车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

[16] 《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论语·宪问》：“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17] 《释名》卷一：“周制……四丘为甸。甸，乘也，出兵车一乘。”又元·刘因《四书集义精要》卷六：“包氏谓八十家出车一乘，马氏谓八百家出车一乘。”

[18] 宋·易祓《周官总义》卷二十八：“先郑以垆为量名，亦无据依。以冶氏重三铎考之，古文以铎为铖，而《书》有罚百铖之文。岂铎与铖音相近而传者或失其真乎？”

[19] 学者们多认为《考工记》是齐国官营手工作坊的技术规范，见戴吾三《考工记图说》第1~2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

[20] 载《中国钱币》1989年第1期。

[21] 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第40~41页，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文博简讯

四川博物院新馆落成开放

四川博物院新馆近日落成并于5月9日起对市民免费开放。

四川博物院始建于1941年，是为四川省博物馆。2009年3月11日更名为四川博物院。

新落成的四川博物院新馆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历史、艺术综合类省级博物馆之一，是灾后重建四川精神文化家园的一项重点工程。四川博物院拥有藏品26万余件，其中一级文物1399件、二级文物6731件、三级文物95345件。在全国省级馆中藏品数量和等级均名列前茅。馆藏文物以巴蜀青铜器、汉代陶石艺术、南北朝佛教石刻造像、藏传佛教文物和张大千绘画艺术为亮点。

四川博物院收藏的张大千绘画作品堪称量多质精，收藏的张大千先生各类画作近400幅，为全国之冠。

四川博物院占地88亩，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新馆包含10个常设展厅，4个临时展厅，可一次性展出文物5000余件，且能举办各类文物和艺术品展，透过最先进的多媒体陈列展示，将向广大观众提供全方位、立体的历史和文化艺术体验。10个常设展厅的名称分别为：蜀风汉韵（汉代陶石艺术展）、巴蜀青铜器、泥与火（瓷器馆）、大风堂（张大千艺术馆）、古代书画艺术精品展、大山回响（四川少数民族文物展）、古风雅韵（四川工艺品展）、百年回眸、西蜀神韵、藏佛之光。

（川博供稿）